



富裕社会的消费政治与国家治理

武中哲

摘要:从短缺走向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在某些地域和某些方面呈现出富裕社会特征。可以预见,随着富裕社会的来临,生产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消费的重要性,由生产建构的政治也会转化为以消费主导的政治,因而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方略需要顾及并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消费政治一方面表现为宏观领域的政治转型,另一方面也从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建构着微政治。其逻辑是个体消费行为叠加形成公共性困境以及社会风险,而这些困境和风险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着力点。

关键词:富裕社会;消费政治;国家治理;生产政治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5-0033-08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为了摆脱物质短缺而进行奋斗的历史。20世纪以来,工业化及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开始带动人类社会从短缺走向富裕。发达国家首先迈入富裕社会行列,而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中国人民在历经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也已经感受到富裕社会的来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基于这个事实,关于对消费社会的研究逐步在国内外学术界繁荣起来,主要涉及对消费文化及消费领域的不平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后者已经触及消费政治的问题,然而其分析框架仍然停留在物质短缺前提下的阶级和阶层分析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普遍性的社会关系的层面。实际上,富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日常生活中消费活动在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消费活动也在形塑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政治内含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可以设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消费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提升,消费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属性。这种社会政治形式的转型与国家治理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一、生产政治与消费政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对政治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同时代的理论对政治的关注各有侧重。从古典理论家对政治的定义来看,无论是宏观的政治还是微观的政治,其指向的关键点都在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只有当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发生联系的时候,才会形成政治关系,也才存在政治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微观的政治问题,当这种关系上升到社会秩序和利益集团层面的时候,就属于宏观政治制度的范畴了,宏观的政治与微观的政治总是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塑造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早期的理论家从社会生活的秩序方面解释政治现象,此后的研究则更多地把政治与权力结合起来。在阶级社会中,政治表现为阶级斗争,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则是特定的经济关系和阶层关系。无论哪个时代,政治都是集体

生活的产物,而人类分工和交换是人们集体生活在一起的原因,如果通过分工和交换能够增加彼此的福利,那么人们就会相互合作,从而也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然而,人们一旦在合作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就会导致不合作,而当不合作成为普遍的人际关系模式时,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紧张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政治上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共权力,以此克服不合作的利益根源,从而使人类的一切其他形式的合作成为可能。由此,从人类生活的本源上讲,政治的过程就是运用权力协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秩序的过程;政治的目标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在阶级社会中,则是保证统治阶级利益实现。韦伯笔下的政治现象被归结为命令和服从关系,他认为,当人际间的关系是在一个命令服从的模式中互动时,就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领域^①。命令和服从关系植根于其科层制的基本理念,而科层制则源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因此,包括韦伯在内的古典政治学思想涉及的政治问题无不来源于生产或与生产有关的经济领域,涉及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短缺的社会,同时也是以生产为主的社会,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衍生的政治关系无疑会打上生产的烙印。

一个时代的政治总是与这个时代中人们运作社会生活、追求自身权利的活动相联系。马克思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与此相伴随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工人运动的核心是反抗生产中的压迫与剥削。这些都构成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力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宏观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在生产力框架下建构的政治形态成为此后学术界关注的生产政治。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系统地提出生产政治理论,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为生产政体,他认为生产领域也存在着自身的上层建筑,亦即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②。可见,生产政治是生产组织过程的产物,生产过程中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较量决定了生产政治的属性和走向。

然而,人类的活动并不仅仅是生产,生产在本质上是解决消费问题的手段。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与生产政治相对应的必然也会存在消费政治。消费政治赖以产生的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已经告别短缺、进入富裕社会的阶段。富裕社会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他指出,“‘富裕社会’是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社会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力量”^③。在富裕社会中,社会成员的休闲时间延长,剩余人口出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再通过工作发生联系,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消费过程建构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当所有的生产都达到了边际效用最小化并逐步降低,那么提高社会富裕程度就是将所有经济目标的重要性最小化,生产和生产力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④。鉴于此,随着全球发展进入后现代时代,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的存在条件已经显著弱化,人自身及其日常生活正成为中心议题^⑤。这其中,人自身的活动则主要是一种基于社会总体富裕的日常生活的消费活动。美国学者桑德斯首先提出基于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并将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形式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政治模式”。可见,消费政治在理论和逻辑层面已经得以逐步呈现。消费政治就其内涵来看,是反映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以消费为中介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中内含的权利配置、统治关系和合作模式及与之相关的诸多方面构成与消费活动相关的权利关系,故称其为消费政治。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生产与消费是相互关联、互为前提和条件的,因此消费政治与生产政治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而是交融于社会生活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同,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比重不同,因而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的权重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国家治理层面表现为,不同类型的政治关

① 顾中华. 韦伯学说.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64.

② 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 沈原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89-290.

③ 加尔布雷思. 富裕社会. 赵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

④ 加尔布雷思. 富裕社会. 赵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19.

⑤ 王雅林. 生活方式研究的社会理论基础. 南京社会科学, 2006, (9).

系存在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因此也必然需要不同的治理手段。当下,中国社会还存在严重的贫富差异,发展仍然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第一要务,因而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也必须顺应这个大的前提。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经过长期的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上开始步入小康社会,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相当规模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经济收入来源愈加广泛,工作不再是获得收入的唯一手段,与之对应的是社会自由度极大提升。许多大中城市的繁荣程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探索这种改变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关系的变化。也就是,我们需要从生产与发展的单项思维中解放出来,关注生产关系与消费关系的协调,关注社会富裕之后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而这一点应当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其中内含着与时俱进的国家治理的新理念。

二、由生产政治向消费政治的宏观转型

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永远是相伴而生的一对矛盾关系,随着富裕社会的来临,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活动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改变了以往的社会整合路径。通过增强消费者的自主性重构了权力关系,因而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生活单一垄断的格局。在宏观层面上,社会不仅受着生产政体的支配,而且受着消费政体的支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产型意识形态转向消费型意识形态

在传统的生产社会,意识形态在高度的生产组织体系下,沿着科层制的轨道自上而下为民众接受。与社会物质短缺相伴随,人民群众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能够更好地吻合起来,一种宏大的以社会富足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对人们产生一种激发和整合作用,因而具备较为坚实的社会团结的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日渐富足,消费领域的个体自主性与生产领域严格的制度约束形成明显反差,传统意识形态的效力在消费社会中也开始衰减,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规训作用的相对减弱。在传统意识形态作用消减的同时,消费活动中内含的特定要素则渗透入大众的思想理念中,因此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功能。“消费使用某种编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来驯化消费者,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据此,消费替代了一切意识形态,并担负起整个社会一体化的功能,类似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①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游戏规则和编码依靠媒介传播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认同机制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多元的流变趋向。麦克卢汉认为,广告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走向极端,不断提升自身的说服力,因而最终发挥了洗脑的作用^②,正统权威意识形态的传统根基已经受到影响。传统的生产政治与科层制中的指令和命令相关联,消费政治中的支配和控制全然是另外一种逻辑。随着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以诱惑、劝说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生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③。非但如此,消费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与国家的利益可以一致起来。消费过程不仅是使用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容纳了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和集体心理。只要有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消费,就会有与之相伴随的国家之间的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基础层面表现为民众消费行动的政治化。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近期也偶发抵制日货和韩货的群体事件,这些事件中渗透了一种民族情感,民众将商品赋予了国家的符号,通过消费行为的“用脚投票”来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

(二) 生产组织的社会阶层转向消费塑造的社会阶层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凡是阶级社会同时也是生产型的社会,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论述就恰当地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工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合作,才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团结起来、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的集体。由于消费社会的团结度开始下降,阶级的形成,特别是具

①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刘成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0.

②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0.

③林晓珊. 重返消费政治:消费不平等研究的历史逻辑. 广东社会科学,2016,(3).

有行动力的阶级的形成受到了实质性的限制。鲍曼认为,生产活动需要集体合作和协调,而消费则是完全个人、独立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①。然而,这种独立和孤独并非说明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恰恰相反,人们的消费活动在自由的外表掩盖下经历着社会阶层的对号入座。不管是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饮食、衣着、住房等私人消费品,还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等集体消费品,消费无不被打上阶级阶层的烙印。不同阶级、阶层间对消费资源的攫取也毫不例外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对稀缺消费品的分配和占有,从来都是政治规划的必然结果^②。按照波德里亚的观点,消费社会中特定的阶层分化是通过消费行为展现出来的,表现为由符号消费所标示的人们在物品面前越来越不平等^③。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从过去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绝对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参照的相对主义。如此,富裕社会导致了大众普遍的心理贫困,也就是无论对财富的占有量增加到何种程度,社会大众总会感觉到新的匮乏和不足。可见,在一个以消费为主的社会中,传统生产社会中以职业为指标的社会分层受到了挑战。社会成员的阶层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得以显示,“我消费,我就是”,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通过“相似性联想”确定自己的阶层地位;逐渐地,这种联想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被标定,且通过媒介的传播被大众所理解,然后付诸实施;最终,传统阶层意识被符号化的消费意识压抑到无意识的领域。

(三) 适应生产的社会统治转向消费建构的社会统治

每个社会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管理和统治手段,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这种统治手段的确立必然要依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成员所从事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富裕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工作的紧迫性降低。随着工作逐渐从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复制的汇合点的中心位置脱离出来,工作伦理慢慢从最高管理功能上滑落下来。“到目前为止,工作伦理已经从之前其直接或间接统治的许多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中退出,或者被推挤出来。”^④中国社会在建国以来运用单位体制的生产组织制度完成了对全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单位组织成为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⑤。在此制度框架下的各类单位组织不仅仅是生产的单位,同时也是承担政治职能的管理单位。而这种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社会大多数成员被组织在单位组织中从事生产活动,如果没有了这个条件,单位体制作为社会统治的功能则不可能发挥出来。

在消费社会,这种以分配资源为基础的组织制度已经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条件。随着单位组织功能的弱化以及社会自由度的广泛提升,建立在国家层面的社会统治关系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无疑,计划经济时代将大多数城市社会成员组织到各级各类单位,将农村社会成员组织到人民公社的高度组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广大社会成员也从生产社会中的组织化开始过渡为消费社会中的原子化。这取决于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生产之外”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如鲍曼所言,剩余人口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无用人是现代化无法逃避和难以处理的后果,形影不离地伴随着现代性。它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⑥。正因为如此,富裕社会中也需探索建构新的统治机制。在生产占主导的社会中,由于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均,消费中的不平等广泛存在,因而其中也必然包含着一种政治实践。只是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中,这种政治实践不再基于资源的短缺与分配的不公,而是基于一种在资源丰富且普遍具有较高消费能力基础上的管理和统治逻辑,它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建构。

① 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 仇子明, 李兰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74.

② 林晓珊. 重返消费政治: 消费不平等研究的历史逻辑. 广东社会科学, 2016. (3).

③ 布希亚. 物体系. 林志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75.

④ 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 仇子明, 李兰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84.

⑤ 李路路, 李汉林. 中国的单位组织: 资源、权力与交换.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18.

⑥ 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 仇子明, 李兰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65.

三、日常生活中消费政治的微观建构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普通人远离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动员,日常生活成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主要生命历程,因而政治也必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也因此,有学者提出微政治概念,并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微政治时代。其主要含义是,今天的政治已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逐渐淡化,而主要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更多地涉及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①。微政治源于个人化力量对集体主义权威的消解,无疑与社会的组织方式相关。生产型的社会强调集体威权,以此形成管理的组织化网络。而消费型的社会则是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脱离了组织的束缚,消费领域的个性化消解了传统权威的规制。与生产社会中的逻辑不同,日常生活中消费的政治性在根本意义上体现为个体行为的社会后果,表现为个体消费的自由与由此建构的公共性后果之间的矛盾。

(一) 消费的限定性条件及公共性困境

首先是自然的局限。在富裕社会,人们普遍具有了较高的消费能力,消费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极大的拓展。然而,这种拓展并不是一路凯歌,当自然界不能承受过量的消费强度或消费广度的时候,就会形成公地悲剧。公地悲剧是美国经济学家拉丁提出的概念,其核心意思是在没有产权限制的情况下,由于人们过度的无偿使用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枯竭会导致这个领域的消费本身成为稀缺的,进而具有了额外的经济价值。稀缺性越高,这种额外的经济价值越大,直到将一部分无力支付过高价格的人被排除在外以后,才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因而经济问题过渡为政治问题。从国际范围看,国家之间的战争无不涉及自然资源的争夺。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就是因为中国发展了,人均消费自然资源的能力会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地,美国国内则会承担更大的压力。例如,水资源、石油资源和粮食资源的全球配置都存在一个利益均衡的问题,一个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体现着不同阶层之间消费权利的差别。稀缺性也必然导致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消费领域的特权,即便这种特权不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规定,通过高昂的价格壁垒也会将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排除在外。

其次是社会的局限。消费需要有社会设施的支撑,凡是在消费过程中必须利用公共设施的消费,都应当具有消费的公共性。汽车的功能在于能在马路上跑,如果缺少了道路等公共资源,汽车消费就不可能实现,汽车的效用发挥取决于马路的数量、宽度与上路行驶的汽车的总数量。在马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汽车数量的增长就意味着每一辆车的使用都要受到限制。别人的使用会影响到自己的使用。当这种使用权受到严重挤压的时候,必然会提出权利的划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公共裁决,也就是需要一个民主化的政治过程,最终要落实到政策和法律领域来解决。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道路拥堵的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有些学者甚至用“汽车社会”来描述当代社会,可见汽车消费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前,人们很少会思考这个问题,只是社会中少量的有车族在享受使用汽车带来的便利。可见,汽车使用的便利是以社会中大多数人买不起汽车为条件的;而当这个条件发生彻底颠覆之后,原初的便利也就消失了,甚至转化为麻烦,形成社会性的公地悲剧。

(二) 消费建构的风险及社会影响

1. 消费社会的风险。消费社会来临的前提是生产已经非常充足,因此,人们的消费形成一种思维的习惯,即所需要的东西是消费不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一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中断供应或质量难以取得大众信任的时候,就会形成消费的恐慌。这也是现代性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2011年因为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辐射,一些社会成员认为中国的食盐质量会受到影响,进而引发抢购风波。虽然该事件在短时间内得以平息,但这种由消费领域引起的恐慌应当是现代消费社会中经常出现的事情。该事件的原因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的集中和规模化,生产场域逐渐远离平常人的视野,

^①王丽萍. 微政治与社会情绪管理. 学习与研究, 2011, (12).

脱离了“亲自在场”的途径,人们对产品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等各种信息渠道^①。消费品也必然非自身所能操控,因而大众的认知就很容易被信息所左右。加之现代社会中网络、微信等信息渠道极快的传播速度,消费领域的谣言很容易被传播扩散,进而演变为现实中的恐慌和骚乱。也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领域要比传统社会面对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不仅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直接影响,甚至会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手段。通过制造谣言引领大众认知,并由此打击对方或获得利益,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2. 消费的个体承载力与社会危机。消费具有社会传导性,消费能力虽然与个人的经济能力直接相关,但是消费的意识 and 理念无疑具有社会建构特征。在众多的商家促销、银行信用卡超发、社会中弥漫着一种提前消费风尚的背景下,特别是发生在青年群体中的超前消费甚至盲目消费也日渐普遍。然而,如果忽视了个人的能力进行非理性消费,不仅会给个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引起经济或社会生活中的危机。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随着经济的富裕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美国老百姓普遍形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这种超前消费在大众情绪的感染之下会逐渐膨胀,乃至脱离于民众的实际经济能力。在房地产领域,人们坚信只涨不跌的神话,为此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通过按揭手段涌入住房市场,当最终房价大跌、泡沫破裂时,银行的大量贷款成为坏账,结果造成了一场几乎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追赶型经济,同样存在着陷入泡沫化的潜在风险。其理由是,在经济追赶的后期,要素相对价格以及产品相对价格的优势发生改变,传统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而导致经济脱实向虚^②。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非常容易脱离实际,积聚泡沫,最终导致阶层之间利益的剥夺,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进而演变为更大的社会风险。

综上所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消费的微观行为建构着社会关系,塑造着富裕社会的政治生态。马克思基本理论中的生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延伸到消费关系的范畴。传统社会中相对单一的生产政体演变为生产与消费的协调与互动,这个过程中也同时建构了不同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这无疑是一种在传统社会中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政治现象,并存在向未来延伸的趋势。也因此,与短缺时期的生产社会不同,富裕的消费社会中权利关系更为复杂,社会秩序更加具有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国家治理的手段因而也必须顾及时代的特点。

四、消费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治理

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国家治理的本质在于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维持特定秩序。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代中国社会,国家治理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治理,社会性治理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富裕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政治逻辑,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制与社会实践中的新的政治逻辑相适应,这也是推动国家治理机制创新的内在动力。面对着富裕社会中的消费过程所建构的公地悲剧以及各种社会风险,国家治理应当关注宏观层面的秩序与微观层面的自由度之间的平衡,在宏观层面由以往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向多元化的社会公共治理模式转化,在微观层面应致力于规范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努力使个人的行为满足公共性的需要。治理是以社会成员的共同需求为基础,是一个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来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③。与传统的生产型社会相比,富裕的消费型社会更需要基于公共利益的合作。鉴于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中所内涵的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和机制,在富裕社会来临、消费政治凸显的宏观背景下,国家治理模式应当与时俱进,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创新的路径和元素,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①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502.

②王庭东.中日经济追赶过程中的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经济泡沫:比较与借鉴.现代日本经济,2015,(5).

③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线,2014,(1).

（一）富裕社会的治理需要组织与制度的创新

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组织逻辑，因而在富裕社会的背景下，传统的社会组织秩序必然具备重构的动力。影响组织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则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权利和义务，这种秩序是在消费过程中实现的，主要通过对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并且通过对物进行比较、分类，赋予我们所拥有和使用的物以秩序，以此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关系^①。这里体现出了通过消费组织社会关系的思想，但是尚没有充分体现出消费过程中所真实反映的权利分配的规则。只有确定了权利分配的属性和规则，才能筛选和确定大众公认的意义，以此取得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秩序。消费过程中的权利分配一般会采用以下几种手段，一是采取强制力量使一部分人拥有消费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没有资格拥有消费权利；二是采取协商的手段，经过投票决定让哪些人享有消费权利，哪些人不能享有这些权利；三是采用经济杠杆，通过提高价格、增加额外的收费等手段抬高消费的门槛，将一部分人排除在该消费领域之外。第一种是暴力手段，结果必然导致国家力量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蚀。特权消费在短缺时代是通过特殊供给实现的，现如今则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绿色通道得以实现。第二种是民主的方式，前提是哪些人有投票的权利，这里就涉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为获取消费权而进行的集团或群体之间的斗争也在所难免。第三种是市场化手段，最终结果是将社会中相对较穷的群体排除在某些消费领域之外。当消费的成本提高到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部分群体难以承受经济的压力而选择放弃。因此，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中，处理这个问题势必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而导致不同的后果。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关注民生的国家，在一个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国家，处理类似问题的政治过程与一个独裁的国家、专制的国家的方法肯定是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较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显著的地区差异，在国家治理层面需要同时关注维护公正和促进发展两个方面，通过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消费权利。

（二）富裕社会的治理更需要法律与道德的约束

由于消费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的公共性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必然存在法律关系。法律是公共性的体现。在消费领域，每个消费者都不是孤立的，他们内在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从消费中获得的价值随着新的使用者的加入而发生变化，因而由过去的经济领域的消费问题演变为权利分配问题。富裕社会中的公民权力具有突生和建构的属性，这与传统社会明显不同。以往并不存在的空间权和新鲜空气权在现代富裕社会中都已经成为现实。“‘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空间的稀缺，乃至空间 and 宁静成为一些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获得的特权。”“‘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开始成为商品，并进入不平等社会的再分配的行列。”^②这些新生的权利关系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这也是未来法律制度的一个延伸方向。道德与法律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互相补充，互相协调。消费领域的道德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为他人带来了福利，最终也使自己受益。道德的取向是一切从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容量出发，衡量自身行为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从而自觉做出调整。因为从消费权利的分割来看，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排斥的，而生产社会中则是合作的，所以富裕社会中更需要道德的规范。生产过程中有纪律约束和工艺规范，而消费则是一种个体的自由化活动。在富裕社会中，虽拥有较大购买力却过节俭生活就是一种道德自觉，“俭以养德”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更加具备了现实的生命力。加尔布雷塞曾指出，勤俭和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因为它们保留并增加了维持生活的商品供应。对经济行为核心的分析和经典传统的阐释不仅包含一套经济政治原则，也包含一种道德原则^③。如果消费领域的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消费导致的公共性危机对社会生活的危害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边界的话，那么政府就需要考虑利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规范和干预。因此，消费政治的转型为国家治理中的法律创新打开了空间，同时也为消费社会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① 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7。

②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5。

③ 加尔布雷塞。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06。

(三) 沟通和参与是富裕社会预防并解决公共危机的基础手段

社会政治过程在最基础的层面贯穿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活动当中。由于富裕社会中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消费者群体也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的个体自由化与他们的公共需求之间必然产生内在的张力。消费的个体自由化导致社会整合的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依赖行政命令和由上而下的整合模式日渐失效,而需要主张发挥大众社会参与的主体作用,共同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营造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也就是,富裕社会的治理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预防消费主义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伤害,预防消费社会体制使社会个体沉溺于消费而陷入政治冷漠^①。富裕社会中混杂着传统的和现代的权利关系,面对如此的权利关系的交融,需要建立联结社会个体与公共生活的桥梁。这就必然需要建立社会沟通与合作的新机制,需要遵守社会公共性的规范,并努力将这种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其要义是,当社会丢失了传统的整合机制而试图建立一种适应现代富裕生活的新的整合机制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必然是重构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其中,首先要有充分的个体参与渠道,使得民众个体的意见能够畅通地进入公共领域;其次要有第三方决策和评估机制,以避免社会治理蜕变为单一形式的政府治理。因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更多地瞄准增长和福利,所以政府作为公共领域的唯一代表必然存在天然的缺陷,对社会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往往反应滞后,故而导致社会生活中诸多亡羊补牢事件的发生。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个体的意见必须无条件服从于组织的指令、行政的控制和工艺的要求,基于社会公共性诉求的沟通与参与并不具有十足的紧迫性。在消费占较大比重的富裕社会中,个体的意见则会建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反过来会影响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因此,在社会走向富裕的过程中,重视个体的意见,并协调与整合个体意见是优化公共性的基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Consumer Politic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ffluent Society

WU Zhongzh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From shortage to prosperity is the inevitabl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Chinese society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society” in some areas and some aspects. Predictabl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affluent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tion gradually gives way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consumer-led politics, so the basic logic and strategy of state governanc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and adapt to new social realities. Consumption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represents a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acro realm. On the other hand, it builds a “micro-politics” in the micro domain of daily life. Its logic is th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er behavior to form a public dilemma and social risks and these dilemmas and risks have becom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social order, but they are also the real focu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affluent society; consumption politics; national governance

● 收稿日期: 2017-05-03

● 作者地址: 武中哲, 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SH069)

● 责任编辑: 涂文迁

① 张敦福. 消费社会与社会治理的新课题. 文汇报, 2011-09-26.